

「辛亥革命百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林志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百年前的武昌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的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從此中國告別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體制，開始「走向共和」。經過一百年來全體國民歷經艱辛，努力實踐，民主理想終於得以在臺灣具體而全面的展現。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政治成就，早已舉世聞名，實為華人世界的共同光榮。時至今日，中華民國在臺灣已無愧於「共和國」的美名，「憲政」更成為我們政治體制的最高原則；即連中國大陸亦必須在形式上標榜「共和」，聲言「憲政」。因此，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想，把國家治理視為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已是兩岸人民的基本共識。

十月三日至四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合辦的「辛亥百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即是站在「落實中山先生的理念，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基礎」上，重新追索辛亥革命、慶祝建國百年的意義之所在。這場會議邀請來自海內外學者共同參與，除了包括臺灣、中國大陸與香港各大學學者外，還有遠自日本和澳洲的專家，一共發表 19 篇論文，回顧辛亥革命百年來的發展。在會前，總統馬英九更親臨現場致詞，並預祝兩天會議得以順利圓滿成功。

第一天議場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大型會議室舉行。首先是由張玉法院士主題演講，題目為〈革命主義的新潮：晚清革命黨人對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宣揚，1907-

1910〉。張院士指稱：1905年，孫中山正式標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而維新派的梁啟超與革命派則在《新民叢報》與《民報》上展開論戰。之後1907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請願速開國會立即成為全國性運動，頓時革命事業陷入低潮。儘管孫中山、黃興等人仍不斷在各地起事，惟效果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批革命黨人則專意宣揚無政府主義，使得革命的主張變得愈發激烈。例如：章炳麟假《民報》宣傳哲學的無政府主義，而《天義》和《新世紀》則是宣揚無政府乃至無政府共產主義。這些風潮雖然多屬編者個人之興趣，並不能代表同盟會官方的主張；但顯示在1907-1910年間，世界各地無政府共產主義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中國的革命黨人並未因而缺席。事實上，無政府主張加上虛無主義的宣傳相互配合，的確對革命黨人的戰略與戰術產生不少影響。從這段時間此起彼落的革命黨人暗殺活動便可知，也藉此激發了革命精神。

首先開始進行第一場議程的，是重新理解辛亥革命性質，分別由黃克武、陳三井、黃自進教授發表論文。黃克武教授〈辛亥革命是怎麼成功的？：回顧與反思〉一文，強調必須注重晚清七十年間新思想的傳播，以及在民國建立的過程中，立憲派和地方士紳扮演的角色。由於晚清時期，西方思想開始被引介到中國來，加上留學生迅速增加；透過他們的中介，各種新思潮更形深入。無論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譚嗣同的《仁學》，

還是梁啟超的《新民說》，經由新興出版業的傳播，啟發了許多人，成為革命的溫床。換言之，辛亥革命的事件或許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後，卻有著長期孕育的思想動員。過去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受到國、共兩種官方論述，尤其國民黨的「革命史觀」，以及共產黨「社會發展的階段論」所影響。然而今日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後，張朋園、汪榮祖等學者的研究卻揭示了立憲派士紳在晚清的努力，與革命黨之間既合作又角力，共同促成共和的誕生。儘管革命成功背後各方勢力的妥協性格，導致日後民主過程中產生諸多挫折。可是，當時提出的政治框架和思想藍圖，卻成為重要的思想資源。以臺灣而言，民權主義提供了反對運動的理論基礎，進一步促進戒嚴的解除。

陳三井教授〈留歐知識社群與孫中山革命〉，探討以往較為忽略的歐美留學生對辛亥革命的影響。陳教授指出：他們之所以凝聚力量形成革命團體，緣起於1905年初孫中山的歐洲之行。由於雙方暢談辯論，進而互相影響。此後孫氏的革命方針從會黨轉向重視知識分子，甚至聯絡新軍，也與這次辯論後的態度修正有關。有關留歐的知識社群中，除了留學生之外，尚有以商人、遊學者和出版界為中心的結合。陳教授指稱：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發起的世界社與《新世紀》（*La Novaj Tempo*）週刊，提倡人類互助進化，鼓吹世界大同，宣揚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們的構想雖與孫中山不盡相同，但熱

心投入革命事業；在宣傳革命的進程中，雙方形成一種彼此尊重的競合關係，發揮重要的助力。

黃自進教授〈日本人的辛亥革命觀：「趁火打劫」與「同舟共濟」之間的論爭〉，從日本角度來思考辛亥革命的影響。毫無疑問，此前日本政府認為：「君主政治」本屬東亞世界共有的政治體系；一旦中國革命思潮流行，否定「君權神授」的理論，勢必危及日本皇室的存續。與此同時，日本民間社會除少部分擁護政府主張外，大多抱持同情辛亥革命的態度。有些軍人曾參與訓練中國的新軍；而部分社會主義信徒，對中國革命理想有所共鳴；在野黨人士則以辛亥革命為反面教材，警告日本政府不可忽視民意，落實立憲體制。究竟面對革命浪潮，日本應該「同舟共濟」，幫助中國民眾推翻暴政；抑或「趁火打劫」，伺機拓展利權？黃教授認為：辛亥革命的評價與日本現實政治，形成相互牽引之勢。可惜在功利的算計下，日本錯失了與革命政府扶持合作的機會，反而伺機擴大在華權益，逼使追求中國國家主權獨立的中國革命運動日後以日本為敵。因此，中日雙方互不見容，事實上在辛亥革命時期，早已呈現端倪。

第二場議程關心的主題，都與革命先覺者孫中山有關。林啟彥教授〈孫中山早期的革命活動與三位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南方熊楠、宮崎滔天（1895-1900）〉，以三位日本友人的襄助為例，探討孫氏如何從一

位叛亂分子轉變成為具有世界視野和政治理念的革命者。梅屋與孫中山在香港結識，支援了革命經費，籌辦軍火，庇護孫氏留港的生活，並協助逃離清廷的緝捕。南方與孫中山在倫敦結識，共渡蒙難的歲月；彼此的理想相同，話題多不離英國的富強之道以及振興祖國、拯救亞洲各民族被奴役的命運。宮崎結識孫中山於橫濱，因一夕之談發現志同道合；他的努力使孫中山得到了日本朝野部分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獲得財政與政治上的奧援與庇護；更重要的是，宮崎為孫氏在日本社會及留日知識群體之間建立革命家乃至革命領袖的形象與地位。林教授認為：儘管孫中山與上述三人的結識純粹基於偶然，但亦有其歷史的必然性。由於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鞏固了孫中山改革中國的決心，以及尋求日本援助中國的期望。中、日兩國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之夢，則造就志同道合之士互相的動力，提出「大亞洲主義」的想像——建立一個清除種族間的歧視、壓迫、奴役，體現平等、自由、人道與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沙培德（Peter Zarrow）教授〈孫中山的革命先鋒主義思想〉，分析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後思想上的轉變，強調以一個組織嚴密、擁有高度紀律的革命政黨推翻現存政權後，再來領導全國。此一構想落實在1914年所創立的中華革命黨。沙教授提醒我們：孫中山構建中華革命黨時，也已預見到一個長期而不確定何時結束的訓政「革命

時期」即將開始，甚至經由黨來進行直接控制。呼應到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的《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一書，實際上兩人都同樣面臨了救亡圖存國家裡之革命領導權的問題。1919年《孫文學說》的出版，孫氏便提出了對「自由」的懷疑，諸如個人主義與有限政府關係等，尋求非自由形式的民主制。這些為孫中山晚年向俄國革命的學習提供了準備，儘管他拒斥馬克思主義，卻採納列寧式的政治技術。此外，孫氏對革命的理解有賴於一種認識論上的菁英主義，形塑了他對革命組織和憲政秩序的看法。本文結論是：孫中山也許並未創造一個意識型態或「主義」，可是他幫助並建立了現代中國黨治的基礎。

潘光哲教授的〈《大革命家孫逸仙》探源〉一文，以1903年章士釗取宮崎滔天的自傳《三十三年の夢》（1902年出版），「譯錄」為《大革命家孫逸仙》一書進行探討。文中指出，《大革命家孫逸仙》頗有替孫中山打造「革命領袖」形象之嫌，且為革命風潮添加無數思想動力。然而，書中多有筆走龍蛇的「創造」，既與原著距離遙遠，也非孫中山生命史的本來面貌。更有意思是：章士釗一方面對塑造孫中山的崇偉形象同時，也將政敵康有為加以「污名化」，並否認其主張。此外，章氏譯出「共和主義」的革命目標，也為當時思想界添加了「主義化」的內容。換言之，該書有關種族／民族主義的號召與思想基礎，其實構成廿世紀初期中國

「革命想像」的要素。

第三場議程繼續環繞在非革命因素在辛亥革命後的發展。朱法源教授〈從主要成員的信仰成分重觀辛亥革命的性質〉，指出過去國共雙方的歷史敘事都忽略了基督教會這一面向。事實上，許多參與革命事業中，都有基督教徒的背景。例如1895年廣州起義的領導分子鄭士良、陸皓東等均為教徒。他們既享有治外法權，又有外交、武力作為後盾，成為傳播革命最便捷的管道。透過人際網絡與教會密切的聯繫，革命派藉此掩護、協助革命活動的展開。此外，孫中山思想裡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亦與他身為基督徒的背景不無關係。而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教會獨立於傳統中國社會的集會儀式，也提供了孕育新思想的空間。教徒與革命黨員之間的互動，正體現了這一過程。

林美莉教授〈從帝國財政到民國財政：改造借款的議定及其時代意義，1912-1913〉，分析財政與國際外交對革命風潮的影響。辛亥革命爆發後，國際社會以不干涉之名，遲遲未承認共和體制；而中央與地方財政的困難，使得兵變危機頻傳。為了突破內外交迫的困境，袁世凱的新政府保證將繼承前清條約與承認列強在華既得權益，並在內閣總理唐紹儀主持之下，進行一場引進外資以改造中國財政體質的國際借款談判，即日後的「第一次善後大借款」。林教授透過檔案史料，觀察國際社會如何透過借款協議提出改良中國財政體質的具體構想，並試圖

理解中國代表如何在民族情緒之下，應變攻防而奠定新興民國的財政基礎。結果這項充滿國際外交角力的決議，居然在短短一年間滿足各方的需要。列強得以保障其在華外債賠款無虞，北洋政府主政者因此獲得財源及穩定政權；至於堅決站在反對借款立場的國民黨，則從反袁戰事之中確立了發動革命的合理性。

林志宏教授〈日人西本省三對辛亥革命後民國的觀察和議論〉，以「中國研究專家」西本省三為例，思考日本對民國建立後時局的反應及政策。西本是日本少數主張清朝復辟論者。辛亥革命後，他與友人在上海創辦報刊，鼓吹恢復中華傳統；又結納上海的滿清遺民，對民國政府多所批評，並以自己的人際網絡發表興復清室的言論。這些「考察」除了成為後來西本對中國的認識外，進而也影響日本政府對華的「大陸政策」。簡單地說，西本的思想同時具備傳統和現代的資源。他所批判的民國，並非純粹屬於「靜態」的改朝換代，而是一個兼容國際情勢變遷下深具「動態」之現象。西本的「大義名分論」主張，看似夾雜了許多對民國不滿的情緒，其實也符合日本在 1920 年代初期外交政策與國際原則——特別是華盛頓會議之後日本國策所面臨的轉向。由此也可以得知：日本帝國主義逐步擴張之際，辛亥革命後的民國十年間到底給予日人思想上何種轉折？尤其那些旅華的日人，又是怎樣勾勒他們對「中國非中心化」和「東

洋再編」的理解，並由此邁向日後「東亞共榮」的殖民思維？

第二天移師到中央大學文學院 A302 室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一場主題演講，由汪榮祖教授擔任主講人，題目是〈論辛亥革命的三股動力〉。汪教授指出：辛亥革命之形成與發展，其實由三股動力激盪而成。除了革命黨以外，尚有眾多鄉民和士紳。而武昌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由於各省紛紛響應；而各省之所以響應，主要歸功於士紳之合作。更因為士紳的參與和主控形勢，導致革命後出現「反革命」的現象。本來士紳為中國社會裡的菁英階層。拳亂之後，清廷為了籌備立憲，在中央設立資政院，地方上成立諮議局，議員多為士紳，提升了他們的政治權力。然而，川漢粵鐵路的收歸國有政策，激發四川保路運動，官紳之間的摩擦更擴及到經濟利益，裂痕也為前所未有。此外，清廷為了應付大量賠款及推行新政，徵收名目繁多的稅收。此舉引起地方鄉民激烈的反彈，也導致窮苦佃農因抗租與地主發生衝突。革命黨人除與少數會黨有所聯繫外，並未能夠掌控這一普遍的鄉民抗清活動。可是鄉民暴動卻不自覺為辛亥革命創造了條件，給予士紳沉重的打擊。武昌革命的消息傳開後，擴大了全國各地的恐慌與不安，士紳雖在意識型態上無意革命，但害怕動亂危及利益，故在形勢所迫下參與革命。士紳的政治影響與社會地位於是隨著共和建立而增強。革命之後，軍閥、地主、官僚的勢力繼續支配國家

主要資源，農民的騷動遭到鎮壓；而士紳們為了尋求強而有力的中央領袖，使得二次革命時決定站到袁世凱一方。

第一場議程針對辛亥革命的價值觀提出檢討。姜義華教授〈中華天下國家責任倫理與辛亥革命〉一文提出：辛亥革命的領導者都來自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層。他們之所以奮起革命，是基於中國所固有的「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責任倫理；同時受到「家國共同體」的影響，使得每一個人人都自覺必須承擔起對家庭、鄉里、國家、天下的責任。姜教授修正革命志士並非過去中共革命史學中定位的「資產階級」；儘管曾接受過西方近代資產階級的思想與文化薰陶，可是他們多認同當時歐美蓬勃的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粹主義運動，除了借鑒西方文明以追求富強外，也關注到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問題。至於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責任倫理，其實亦影響了民族國家的想像。雖然革命黨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又傳入西方民主成為思想武器。可是傳統的天下國家想像，也成為他們重要的思想資源。直到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革命黨領袖正式承認「中華民族」這一全新概念，而「中華民國」也在此一框架下，確立日後中國以「多元一體」為標榜的多民族統一國家架構。

朱永德教授〈辛亥革命的理想與實踐：淺談文化傳統與民主憲政〉，則反思辛亥革命以來種種歷程。從目的來說，辛亥革命消極面是推翻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積極面

是建立民主憲政的共和國。然而，民主法治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積聚綜合而生，與中國固有文化有所差異。但孫中山不只提出三民主義，也瞭解中國的民情，主張欲完成革命，在軍政後必有一段「訓政時期」。換言之，中國人在實行民主憲政之前，先經過教育和訓練，學習、瞭解何謂民主。他的理想在百年來中國歷史屢遭限制，因此無論二蔣的「威權統治」或是毛的「民主集中制」，皆脫不了中國固有的專制傳統。故兩岸百姓在教育與國民生活未發達前，亦難走上民主進程。但作者樂觀表示：1949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教育普及，經濟高速發展，且歷經多年民主化過程，大致具備進入憲政時期的條件，相信民主很快就能到來。

馮兆基教授〈革命、軍變、立憲：辛亥革命三解〉以音樂為譬喻，形容革命、軍變、立憲三個「調子」，是全面認識辛亥革命和理解民初政治的重要關鍵。清末推行「新政」，建立近代化的專業陸軍，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從社會背景而看，新軍的士官可視為下層士紳階層的延伸，因此產生新的軍人文化，傳統的「重文輕武」觀念已不再適用。此外，新軍另外一個特徵是「政治化」。這裡有兩項含義：第一是軍人干政或參政，第二是指軍人對政治的傾向和敏感。後者有利於革命黨人有計劃的滲入軍隊，俟機發動政變。立憲派主要成員是社會賢達和知識界精英，他們試圖鞏固後帝制時期新秩序的地位，故轉向革命，並非偶

然。值得注意的是：士紳與新軍、革命黨人一齊建立軍政府，穩定秩序，形成陳志讓所謂「軍紳政權」。三股不同的力量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環境中互動合作，促成清廷與帝制的迅速崩潰。可是馮教授結論說，由於革

命。山田辰雄教授〈日本辛亥革命研究會的研究概況〉，介紹近年來日本學界對辛亥革命的觀察和新體認。作者認為：辛亥革命是不完全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而且在袁世凱的權力下，議會制民主主義的發展無疑



民國初年的議會——1913年2月1日法國畫報L'illustration關於中華民國成立之初的報導；參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湯化龍。

命未能建立健全的共和體制，使得三方權力造成惡性的政治競爭模式。至於辛亥革命雖打開了閘門，但說民主共和的觀念業已深入人心，則是言過其實。

第二場議程由三位國外學者討論辛亥革

遭到壓抑。山田教授進一步以辛亥之際的蔣介石為例，透過他在《軍聲雜誌》上所發表的言論和思想，觀察一位無名青年軍人面對革命後的意識。在對外關係上，蔣氏認為：統一革命後的中國當務之急莫過於發揚民

族主義與國防意識。其次，必須將周邊諸民族統合為新的中華民國。同樣在內部的政治體制上，他則是主張中央集權，強化軍事力量，避免將權力分散至各省都督。這一分析，或能反映出在議會制在遭遇挫折下，謀求新的路線和期待。而國族主義與中央集權的構想，也在 1920 年代後的政治變動中展現出來。山田教授在本文最後，也預告十二月日本對於辛亥革命百年的相關紀念活動及會議。

中村哲夫教授〈東アジア文明史における辛亥革命〉一文，強調革命在東亞文明史上的意義。作者認為，辛亥革命代表人類公德的進步，其成功因素有二：一是中央的衰落與地方的成長，一是貨幣制度的改變，特別是金本位制度造成銀價衰落，深化革命時機的成熟。1911 年革命的發生即是因為財政、通貨、銀行金融三種力量無法平衡之結果。此外，中村教授也注意到章炳麟和蔡元培對佛學的探求，帶來多元的歷史觀，成為變革的動力。因此，否定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辛亥革命的說法。

黎志剛教授〈香山和辛亥革命〉試圖以地方性來談革命的起源。他選擇對與辛亥革命有重要關聯的香山地區，作一分析。澳門自晚清開埠以後，成為香山人出國留學或移民海外的通道，所以香山人得風氣之先，較早接受了西方文明和近代化思想。孫中山便是香山的代表之一員。他最初所籌組的革命隊伍，大致上也和香山華僑有關，特別是以

居住在檀香山為主力。香山華僑除了投身武裝革命之外，更在組織革命團體、辦報、進行宣傳、製造輿論上扮演相當重要的功能，同時並積極捐資助餉、認購各種債券，為革命籌集經費。最後，黎教授總結說到，香山由於上述地理與歷史的特殊條件，於是形成了香山黨人「敢為天下先」的革命傳統。

最後一場議程分別從異視角來解讀辛亥革命。吳俊瑩教授〈《臺灣日日新報》對「清國革命」的認識〉則從臺灣報紙的反映來看辛亥革命。過去探討辛亥革命與臺灣的關係，不脫「辛亥革命激起臺灣反日運動新潮」的敘事模式。本文觀察《臺灣日日新報》，重新檢討當時臺灣民間的肆應。作者指出，辛亥革命的意義或許不如過去形容的那樣，引來臺灣民眾內心激動。無論是擔任「保正」的張麗俊，還是公學校任教諭的黃旺成，他們的日記並無心向革命之情緒，甚至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觀察「清國」變化。同時對於大清的滅亡，遺民氣氛亦不濃烈。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儘管十分關心中國時局的變化，但分屬不同國度，亦止於關心而已，只能無奈置身事外。當時總督府以「保護臺民」為由，停發赴清旅券，影響民眾前往清國的計畫，可能是一般民眾對革命最直接地感覺。此外，中國在剪髮易服的革命風潮下，也帶動了洋服、洋帽的消費，臺灣商人嗅到這股商機，摩拳擦掌地準備與日本內地商人進入中國市場。另一方面，《臺日》、《漢日》在撰寫報導時，也不斷營造隔岸觀

火的氛圍，刻意深化臺灣、清廷兩地天淵之別的論述，顯示當局對中國革命影響臺灣統治穩定仍然有所擔憂。

張世瑛教授〈顛覆的笑聲——辛亥革命中的嘉年華會〉從庶民百姓的角度探析參與、理解與詮釋辛亥革命。作者提出一個有趣說法：辛亥革命在劇烈地變動中，引來許多投機人士將混亂的社會狀況加以戲劇化，使之成為一場顛倒價值的嘉年華會。歷來分析革命時期的剪辮風潮，大都解釋為反滿意識的表現，但剪辮易服不獨為革命象徵，更是新時代裡年輕學子追求時髦的絕佳舞台。這樣的情況直到一年後仍不絕如縷。譬如慶祝辛亥革命一週年的紀念活動，王鈍根在《申報》所畫的漫畫「紀念會中之紀念品」裡，呈現了英雄枯骨、烈士頭顱、快槍炸彈、民脂民膏、剪掉的辮子、旗婦纏足之裹腳布、風流都督與姨太太、女子北伐隊及厚(臉)皮議員等，對於辛亥革命的譏諷之意，躍然紙上。相較於「五·四」以後感時憂國的時代精神，辛亥革命則是展現了一種以張揚身體的「笑」為核心之力量，顛覆傳統的倫理與道德價值。

總結兩天會議成果，發表論文的學者們以各種不同的視野和領域重新探索辛亥革

命，而與會的評論人也各自提出看法，討論相當熱烈。誠如擔任主持人的呂芳上教授所言：近年來有不少相關議題都豐富了辛亥革命的意涵，如從國際性觀點來豐富革命與外交關係、孫中山思想和形象的再詮釋、新式媒體對辛亥革命時期所造成的影響、新清史角度下滿人的處境和復辟問題、少數民族和弱勢族群對革命的看法等，目前已有許多成果，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辛亥革命。這一點也得到主辦單位的呼應。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榮祖呼籲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只要以實事求是來看待辛亥革命即可，無須給予任何標籤。近史所所長黃克武教授則是強調，以中華民國的立場而論，我們是以「局內人」的角度來看辛亥革命，但同時又以「局外人」的視野來理解這場革命的發生和歷程。本次會議各篇論文凸顯出：革命內部本身其實具有一複雜性的機制，而辛亥革命更可以放在國際互動、乃至做為一場東亞革命的現象一環。換句話說，這次百年回顧辛亥革命，帶給大家的是不同於過去主流論述外的辛亥革命。